

约翰·穆勒的经济发展思想

陈 广 汉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1848年标志着以休谟的《人性论》(1739年)和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爱丁堡讲演(1748—1751年)所开始的那个世纪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另一个世纪的开始。”这是因为这一年诞生了两部重要的经济学论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尽管我们不同意罗斯托把马克思与穆勒相提并论的观点,但是穆勒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是值得研究的。

穆勒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财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家以传授或研究财富的性质和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规律为职责;导致人类或任何人类社会条件(它与人类欲望这一普遍目标相关)繁荣或衰退的一切原因的间接或直接作用都包括在内。”^①“在政治经济学中,没有什么比弄清生产增长的规律,生产增长所依赖的条件,生产增长是否实际存在限制,它受什么限制更重要的问题了。”^②因此,我们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构成穆勒经济学的中心。其基本理论可概述如下:

一、经济增长的原因

穆勒指出:“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劳动、资本、土地。因此生产的增长取决于这些要素的性质,它或是诸要素本身增加的结果,或是它们生产力增长的结果。”^③因此,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1)生产要素的增长。在这里资本的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土地被看成是一个既定的量,在劳动与资本这两个可变量中,资本的增长决定

劳动的增长。资本的增加,引起对劳动需求的增加,从而使市场工资高于自然工资,刺激人口增长。资本的增长又取决于储蓄量和储蓄欲望的强弱。储蓄量决定于劳动产品中用于维持劳动者生活必需后的剩余量;储蓄欲望决定于资本的利润、一定社会的文化、心理和制度。(2)生产要素的生产力的提高。穆勒详细考察了决定诸要素生产力的因素。它们包括:第一,自然条件。拥有土地和矿藏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以及气候条件。但是穆勒认为它们并不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历史上看,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国家往往不是拥有良好气候和肥沃土地的国家。第二,劳动力的素质。穆勒说:“工人的智力是劳动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最文明的国家里,现在(1848年)智力投资是如此之低,以致要无限的改进生产力,最好的资源,莫过于使现在只有一双手的人,拥有一个大脑。此外,劳动者的谨慎性,经济性和一般的可靠性也同智力一样重要。”^④第三,社会条件。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个人的劳动报酬尽可能同其劳动成果成比例的社会制度。第四,劳动合作。合作分为简单合作和复杂合作。前者是许多人在同一职业中互相帮助而形成的那种合作。后者是许多人在不同的职业中互相帮助而形成的合作。穆勒又把它称为分业(the separate of employment)。他认为前一种合作对生产的结果一般人也能一目了然,而后一种合作却难为一般人所感知。但它不仅是工业文明的基础,而且对生产的影响更具有根本性意义。第五,企业规模。企业规模扩大,有利于劳动分工,有利于大型机械的使用,有利

于节省交易成本,节省企业管理的劳动,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但是在农业中,穆勒主张以小农场和自耕农制度为主,它们是能在农业中把效率和公平良好结合的一种经营方式。

二、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

穆勒认为:“对生产增长的限制来自于两个方面:资本或土地的不足。”^⑤资本和土地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有区别的。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制约经济增长的是资本;当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制约经济增长的是土地,和一切数量有限、但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的自然资源,如矿藏。因此我们把它分成两种情况来研究。

1. 资本约束型经济的发展。穆勒把当时一些亚洲国家和部分欧洲国家归于一类。他说:“有些国家如亚洲各国,储蓄动机很弱,除非有相当高的利润刺激,其人民将不会储蓄,也不会为获得储蓄的手段而工作。……在这些国家生产不足,劳工很多,没有资本能使自然要素和人力二者相结合。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些国家急需解决的是创业精神和有效积累意愿。其办法是:第一,建立更好的政府,财产更加安全,适度税收,免除在税收名义下的各种苛捐杂税,建立起更永久、更有利的土地租赁制度……。第二,公共智力的提高。消除干扰有效工业的各种习惯或迷信,增加精神活动,使人民不断形成新的欲望目标。第三,引进国外技术,它可以提高追加资本的收益,使资本收益率能与较低的积累意愿相符合;同时输入国外资本,它能使本国生产增长,而不再完全依靠该国人民自身的节俭或远虑。即使这些措施不能使人民的实际状况有所改善,也会逐渐灌输新思想和破除旧习俗,给本国人民一种刺激,使他们产生新的欲望、增长的确信和对未来更大的向往。这些考察多少适

用于所有亚洲人,也适用于欠文明和欠勤奋的欧洲国家如,俄国、土耳其、西班牙和爱尔兰。”^⑥

2. 土地约束型经济的发展。穆勒认为:“还有一类国家,以英格兰为首,在这些国家里,创业精神和有效积累意愿都不需要任何鼓励,在那里人民为了小额的报酬而辛勤工作,为了小额利润而储蓄。……在这些国家里,如果资本的增长不被资本报酬的过度下降而抑制,那么资本的不足是决不会存在的。而资本的报酬不断下降的这种趋势是土地的必然和内在条件的结果。”^⑦土地的这种内在和必然条件就是指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他说:“土地的有限数量和有限生产力是生产增长的真正限制。……来自土壤性质对生产的限制,下象墙壁构成的障碍,墙壁直立于某一特定地点不能移动,它阻碍运动,并使运动完全停止。我们宁可把土地的这种限制比作高度弹性的伸缩带,这种富有高度弹性的伸缩带无论怎样拉长,也难得拉到不能再拉的程度,但在最后限度远未达到之前,人们就感到压力,而愈接近这个限度,这种压力的感觉愈大。……农业部门的这种一般规律是政治经济学中最主要的命题,如果该规律不是如此,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一切规律几乎都和现在截然不同。”^⑧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如何引起利润率下降,这得在穆勒的收入分配理论中才能予以详细说明。穆勒认为,适用于农业的真理稍加修正可以适用于从地球上采取原料的一切技术。例如矿业。“所有数量有限的自然要素,不仅它的最后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而且远在这种能力扩张到极限之前,它们要在越来越困难的条件下生产供给,以满足新增长的需求。然而这种规律可能因为人类驾驶自然的一般能力的增加,尤其是人类对于自然要素的性质和能力的知识的推广和支配力的增强,而停止或暂时受到控制。”^⑨

三、经济增长与部门间的贸易条件

经济增长过程中,部门之间特别是工农业之间贸易条件的变动,以及这种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穆勒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在没有自然和人为垄断时,一切物品的恒久价值取决于它们的成本。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但是穆勒认为,以资本、人口和技术进步为特征的经济增长,对土地的生产品和制造品的生产成本的影响是不同。随着经济的增长,粮食和矿产品的生产成本有上升的趋势。“工业和生活资料的增加,使人口增长成为可能,人口必然会增加。对大多数土地生产物的需求,特别是粮食的需求,将会以相应的比例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生产物的生产成本将随着需求的每一次增加而上升。”^⑩土地生产物的成本上升,主要是因为人口增长引起的。“如果人口静止,土地的生产物在数量上从不需要扩张,那么生产成本上升的原因将不存在。”^⑪农业技术进步是抑制农产品成本上升的力量。因此,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的价格的变动,取决于人口增长和农业技术进步的相互作用。尽管穆勒看到了当时英国和法国,谷物法的废除和农业技术的进步的力量超过了人口增长的力量,但他还是认为,一般来讲,人口增长快于农业技术进步,因而,农产品的价格具有上升趋势。但是工业品的价格变动却完全相反。“当制造业生产在较大规模上进行时,一般来说,制造品的生产成本将会更低廉。”^⑫尽管制造业的原料来自于农业、矿业和自然土地的生产物,制造品的这一部分成本也会受到和农业相同法则的支配。但是穆勒认为,这些原料只是制造品全部成本中一个较小的部分,它的渐增趋势,会因为其它因素的递减而完全抵消掉。

穆勒的结论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

具有持久增长的趋势,而农业和矿业存在两种相互冲突的趋势:其一是生产力提高趋势,生产成本可能因改进而下降;其二是生产力下降的趋势,生产成本因人口增加而上升。其结果是:随着人口增长和工业进步,制造品的交换价值,同农产品和矿产品相比,具有决然下降的趋势。由于货币也是一种矿产品,我们又可定下一个规则,随着社会进步,制造品的货币价格趋于下降。现代国家的产业史,特别是近百年的历史充分证实这一论断。”^⑬在下面我们将看到,这个结论被运用于收入分配理论时,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穆勒认为:“一般所说的产业进步的特征本身主要可归结为三个原因:资本的增加,人口增加和生产的改良。”^⑭他根据这三个原因变动的不同组合,分五种情况,分析了在一个发展的社会中,工资、利润、地租的变动趋势。

1. 人口增长,资本和生产技术静止。

这种变动对分配的影响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粮食的需求和生产不变。人口增加,劳动的供给增加,工资下降,资本家的利润上升。由于农业生产没有扩大,粮食价格不会上升,地租不变。第二,粮食需求增加,农业生产扩大。在工资减少后,工人只会放弃非粮食消费品的需求,不会减少粮食的消费。人口增加必然引起粮食需求增加,使农业生产向粗放或集约的边际耕地推进,由于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新增人口所需粮食,只能在成本递增情况下生产。因此,“尽管工资在数量上下降了,但是同没有下降之前相比,可以表现为同样大的成本和包括了同样多劳动的产品,资本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依据这个假定,劳动者的损失,一部分被为了生产最后部分农产品所必需追加的劳动所吸收,其余部分为地主所占有,地主是

总能从人口增长中获利的唯一分享者。”^⑮ 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恶化。

2. 资本增长, 人口和技术不变。资本增长, 对劳动的需求增加, 实际工资上升, 利润减少。由于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太差, 实际工资上升会使粮食需求增加, 粮食成本上升, 价格上涨。劳动的成本由于劳动者收入增加和构成劳动者收入的商品的成本增加而上升, 利润进一步下降, 而地租则会上升。

“劳动者未得到的资本家的那一部分损失, 一部分转给地主, 一部分被在劣等地上或较差的生产过程中, 不断增长的粮食生产的成本所吸收。”^⑯

3. 人口和资本以相同速度增长, 技术不变。这时, 农产品的价格和货币工资同时上升, 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不变。利润量可能上升, 但利润率下降, 而地租再次上涨。

“资本和人口增长的趋势将以牺牲利润为代价, 增加地租。”^⑰

4. 人口与资本不变, 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最终会使工业品的价格下降, 实际工资上升。在穆勒看来, 它对分配的影响取决于实际工资上升是提高工人消费的“习惯标准”, 还是在现有标准下, 刺激人口增长。

5. 资本、人口和生产技术皆处于上升状态。穆勒认为, 上述四种假定情形的分析, 实际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人口和资本增长对分配的影响, 另一类是生产的改进特别是农业生产的改进对分配的影响。前一原因, 会降低利润, 提高地租和劳动成本。而农业技术改进的趋势会降低地租, 所有使劳动者消费品价廉的改进都会有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的趋势。但是穆勒认为, 在人口、资本和技术均上升时, 收入分配的变动同上述假定情况的推理结论大不一样, 特别是对土地的影响具有本质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 “总产品会更大, 在劳动者之间分配的产品会更大, 总利润也会更大。但是工资

将在更多的人口之间分配, 利润也会分摊在较大的资本之间。劳动者的状况不会改变, 资本家也不会从等量资本中得到更大的收入。”^⑱ 因此, 他得出了一个相当李嘉图式的结论: “一个由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构成的经济进步, 会产生这样一种趋势: 地主阶级的富裕不断增加, 劳动者生存的成本总体上升, 利润下降。农业的改进是后两种结果的抵消力量, 但是这种改进会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第一种结果(尽管暂时受到抑制的情形也是可能的)。人口的增长将把来自农业改进的一切利益转给地主。”^⑲

五、经济增长的目的和前景

穆勒认为: “理论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探索运动的规律, 还应该更进一步的提出问题: 经济进步的目的是什么? 产业进步会把社会带向什么终点? 当进步停止时, 我们预期它留给人类的是何种境况。”^⑳

穆勒首先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 “只有在世界中处于落后的国家, 增加生产才是一个重要目标; 在那些最先进的国家里, 经济所需要的是更好的分配。”^㉑ 经济的增长最终将把人类带向静止状态。当一个社会的利润率下降到这样的程度, 以致资本的进一步增加停止时, 这个社会并进入了静止状态。“人类产业进步的河流最终必然将自己散布在表面停滞的大海上。”^㉒ 但是, 穆勒并不象其前辈那样, 用忧伤和恐惧的目光看待静止状态。他说: “我宁愿相信, 静止状态从总体上看, 是对我们现在条件的一个极大的改进。”^㉓ 这是因为: 第一, 在这情况下, 人类可以通过个人的远虑和节俭自觉限制人口, 它同个有利于财产公平的法律制度相结合, 会使收入得到更好的分配。第二, 它可避免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们为了各自利益彼此践踏、相互冲撞的情形。“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害怕其他人努力向前, 而把自己抛在后面。”^㉔

第三,静止状态只是资本和人口的静止,并不是人类进步的停止。“各种精神文化、道德和社会的进步将永远有广阔的范围,生活艺术(the Art of Living)的改进也有很大的余地,甚至产业的技术也可以在一种特殊的方式下成功地培育起来。这时产业进步的目的不在于增加财富,而会产生它应该产生的结果即缩短劳动时间。”^②

但是,穆勒认为一个国家过早进入这种状态是不好的。他说:“一个独立国家,当其邻国在不断进步时,它过早进入静止状态对该国产生种种不利。”^③政府可以采取推迟它的到来。

六、经济发展中的自由放任与政府的作用

1. 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适度干预论。穆勒认为,自由放任是经济发展的一般原则。他的信条是“人民比政府更了解和更关心他们自己的事业和利益。”^④由此,他反对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反对政府确定法定利息率,干预借贷之间的契约自由,反对对价格实行管制,反对政府给某一厂商在生产和销售上的垄断权。总之,他对阻碍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政府干预持反对态度。但是,他认为,在自由放任原则上,存在大量的例外。“政府的职能比任何一个狭隘的限制性定义所包括的内容更加广泛”。^⑤他提出了一种适度干预论。同其前辈学者相比,他赋予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更大的权利。它们包括:第一,政府在实行收入公平分配上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限制遗产继承权,和对遗产的累进税政策,控制财产分配的不公和收入与劳动成反比的现象。政府还可以干预企业在技术进步时,固定资本增长的速度,使其不减少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他说:“如果资本在机器……上的沉淀或凝固速度太快,以致实际损害了维持劳动者的基金,那么采取措施来缓解这种速度,则是

立法者义不容辞的职责。”^⑥第二,政府在延缓静止状态到来中的作用。他认为在一个发达经济中,政府应把提高资本的利润率作为目标。在这里,他对政府举债、税收和非生产性开支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前辈的观点。他说:“在一个生活富裕,产业繁荣,资本不断增长的国家,政府适度支出公款或举债,用于真正有价值的非生产开支,不仅不会枯竭国家富裕的永久性资源,减少供给劳动人口的资金,反而会增加资本的收益。”

^⑦“如果资本积累具有强烈超过生产改进的趋势,只有通过资本的输出和商业危机的周期性扫荡,利润率才能保持在最低限之上,那么通过税收把将要输出和毁灭的资本吸收过来,其结果只不过是象输出和危机一样,为进一步的储蓄清出了一块地盘。”^⑧第三,政府在启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在本文第二点中已经论述。

2. 私营经济和国营经济相并存的混合经济观。穆勒并不象以往的学者那样坚决反对政府直接从事经济活动。他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分为两种形式:权威性政府干预和非权威性政府干预。如果“政府的干预被扩大到控制个人的自由行动,政府通过命令、规定叫人们做什么,这是权威性的政府干预。还存在另一种非权威性的干预,政府不是采取发布命令和强制性法规,而是通过劝告,公告的方式进行。个人可以自由选用各自的方法去追求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目标,政府可以不予干涉。但也可以不把这些目标全部委以个人,可以建立国家机构去做。……一个国家可以有国家银行和国营制造厂,但不要形成垄断来反对私人银行和私人制造厂。可以有邮政局,但并不反对以其它方法寄送信件。有政府的工程师被人们应聘,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成为工程师供人们聘用。虽有国立的医院,但对私人的医疗活动不加限制。”^⑨穆勒赞成非权威性政府干预,认为

它给了人们比较多的自由。他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并存的观点。

上面我们概述了穆勒的发展理论,它实际上是斯密的财富生产论、李嘉图的财富分配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综合与发展。然而,他的研究重心有了重大转变。第一,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关注经济增长利益的分配;第二,从自由放任论转向在自由放任基础上,实行有限政府干预的适度干预论。第三,通过对功利主义的重新解释,提出个人利益应与社会利益协调。边沁把功利主义原则定义为:“当我们对任何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就看该行为增进或违反当事者的幸福为准。”^③穆勒则认为:

“功利主义以幸福为标准定行为之正当,并非指行为者自己的幸福,而是指一切相关人们的幸福。”“并不在于行为者自己的最大幸福,而是在于全体人的最大幸福。”它

“要求人在他自己的幸福与他人幸福之间做到严格公平。”^④尽管历史前进了一个半世纪,但这些问题似乎在今天的发展经济学中,仍未找到满意的答案。在60年代末期,发展经济学争论的一些重要问题,同上述论题也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穆勒关于引进外资,引进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看法,仍具有现实意义。

但是,穆勒的经济发展理论也存在严重不足。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是建立在两个重要假定之上的:第一,人口的增长同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增长一样,具有相同的速度和无限的趋势。他说:“在研究工业进步的影响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一假定:……即人

口增长同生产和积累的增长是同样长久不断的,无限的,甚至可能具有相同的速度。”^⑤

第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农业产出的增长,总是落后于人口与资本增加所产生的对农产品的需求。穆勒在对收入分配的动态分析后说:“整个分析事实上归结为一点,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这两股力量谁占优势。”^⑥

“在许多国家,人口和资本增长并不迅速,但农业改进更缓慢,人口几乎总是处处紧随农业改进之后,立即把农业改进的结果消灭。”^⑦这两个假定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对于穆勒的理论至关重要。我们认为,这两个假定在某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某一时期可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快增长,农业发展滞后,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就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看,它是不正确的。在许多比较发达的国家,人口增长得到了控制,农业技术进步克服了农业报酬递减对经济的制约。如果这两个前提不能成立,那么他对经济增长前景,以及对收入分配影响的一些重要结论,必然会与经济发展的实际相背离。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纽约,1926年英文版,第1、115(着重点是笔者加的)、156、187、189、189、190、176—177、188、702、702、703、703、710、713、714、714、723、723—724、746、749、746、748、748、751、884、947、737、999、741、821、942、699、719、721页。

⑳㉑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第210、247和253页。

(责任编辑 傅股才)